

工作队的混合组织程度对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影响

——来自贵州扶贫大数据的经验证据

李 树 陈志聪 冉 征¹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工作队是我国独特的基层组织之一，它通常采取“混合编队”的方式，工作成员往往选派自不同职能和层级的单位。但是，工作队的乡村振兴效果在学界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工作队的多样性构成方式是否能够打破实践过程中来自在地复杂场景的阻碍，从而发挥混合组织本身的优势。本文通过使用贵州扶贫大数据构造贵州省拥有原建档立卡户的所有行政村 2014—2021 年的面板数据，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工作队组织混合程度对于村级乡村振兴效果的影响进行非线性关系检验后发现：工作队的组织混合特征不仅巩固了地区脱贫攻坚成果，还促进了地区的多维度发展，对地区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作用。但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在政策执行效果方面存在理论上的边界效应，故应在保持工作队组织多样性的同时，保证一定本地干部的参与比例。

【关键词】：工作队；混合组织；反贫困效果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2) 11—0160—09

DOI:10.13713/j.cnki.cssci.2022.11.011

一、引言

经过长期的反贫困实践和脱贫攻坚的巨大考验，驻村帮扶工作队(现称乡村振兴工作队，后文简称工作队)被视为我国反贫困实践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1]各级、各类工作队长期活跃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线，有力地助推了农村贫困人口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全部实现脱贫。在施行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后，工作队从我国的运动式治理下的产物逐渐转化为常规型治理的制度。[2]然而，学界目前对于工作队促进地区乡村振兴的成效方面存在一定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工作队带动地区发展的机制主要是引入外部发展资源，运用我国独有的“项目制”治理逻辑，从而实现了社会资源的跨部门、跨级别、跨渠道流入。[3]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工作队在联结政府与农民，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力量，调动农民积极性等方面仍具有重要作用。[4]另一部分学者提出，工作队在乡村社会中从事扶贫和乡村治理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如何破解与乡村熟人社会之间的隔阂，项目入户是需要村干部支持的，在农村中，如果没有村干部领路，驻村干部根本就进不去家门。[5]工作队便容易遭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共谋”与“乡-村”关系的闭合，被排斥在这个封闭乡村关系结构之外，[6]使得层级结构分化导致精准扶贫项目与资金的目标群体处于权力与信息边缘，继之而来的结构性排斥导致扶贫项目瞄准出现偏离，[7]最终影响地区发展的效果。

¹ 基金项目：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9ZDA324)；2021 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联合课题)“计算社会科学视角下精准脱贫“贵州样板”的创新路径研究”(GZLCLH—2021—294)。

作者简介：李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计算传播；陈志聪，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特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计算传播；冉征，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上述文献争议的核心在于工作队成员的混合组织形式能否有效地影响地区乡村振兴的效果。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现有的研究存在信度和效度方面的不足。一是已有的研究存在信度上的不足,目前针对工作队混合组织程度对于发展促进问题大多是理论思辨或者是定性研究,[8]鲜见来自定量研究的检验,这可能会对工作队的混合组织所带来的实际发展效应产生不准确的估计。此外,此类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个特殊的时间段,缺乏了历时性比较,因而此类研究的信度有待商榷。二是已有的研究存在效度上的不足,过去的研究大多使用是否增加收入、是否有扶贫资源输入、地区是否摘帽等指标用以衡量工作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优劣,研究效度方面也可能导致对工作队混合组织效应的偏误。三是已有研究对于乡村振兴效果的定义尚未完全统一,有待进一步探索。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本文的工作弥补了目前的部分研究空白,利用政府大数据构造的长时段的面板数据,本文尝试通过定量研究回答工作队的混合组织程度能否影响一个地区的乡村振兴效果;其二,为了揭示工作队对乡村振兴的实际影响效果,本文根据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一方面通过国家制定的“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作为地区反贫困效果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以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地区发展能力作为地区发展成效的测度标准,以村为单位对贵州省工作队的混合组织效应的乡村振兴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为未来全面乡村振兴战略施行下的工作队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混合组织引发的争议

工作队一般采取“混合编队”的选派方式,工作队队员来自不同单位,第一书记、工作队队员(扶贫专干)由省级单位选派,工作队队长、副队长和其他队员均来自驻村所在地州市、县市、乡镇的各部门各单位,[9]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这一做法得以保留。工作队制度的实施使得原来依附于科层体系的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村两委与上级政府的关系形成以工作队为接点的紧密互动的科层关系,工作队实现派出单位与村集体、乡村社会(尤其本村贫困户)的联结。[10]联结的结果呈现出政治动员、跨部门互动和人格化交往等非科层化运作的特征,[11]并作为外部嵌入性力量实现了乡村治理结构优化。[12]因此,工作队开始被学界理解为混合科层组织,因为它具有强烈的科层组织色彩,但同时认为它因在组织构成上具有混合性而与经典的科层组织有所区别,可以被视为混合组织的一种形式。[13]对于混合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s)的讨论最早发轫于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控制的相关问题,[14]这些讨论主要聚焦在公用事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大型企业联盟甚至是国家建立的社会组织上,而鲜见于政府内部组织的讨论。大致而言,从宏观上学界倾向于将混合组织定义为结合了多种社会逻辑依据(societal rationales)的组织;从中观上一般将混合定义为组织形式的组合;从微观上可以把混合组织视为组织或组织成员多重身份的结合。[15]所以,成员的身份来源成为了测量混合组织混合程度或者多样性的一个较为合适的视角。学界一部分观点认为工作队的混合组织特征有效提升了我国的贫困治理能力[1]与我国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率,[16]并被认为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长效保障机制之一。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工作队混合组织特征导致原有场域结构的失衡和解体,导致场域中冲突和竞争的加剧,影响扶贫工作绩效。[8]这样的争议,与来自其他领域混合组织的发现较为契合。在众多混合组织中,科学创新团队也是一种混合组织,科研人员混合的新颖程度决定了该组织的核心绩效(即创新能力)。并有实证发现,不常见的知识组合更容易产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17]因此,通过构建来自不同领域学者的团队,将团队成员的知识进行重组,从而实现一些本来并不常见的知识组合,是一种有效的提高科学创新能力的方式。尽管从理论层面而言,知识的多样性通常有利于创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点往往很难做到,以至于有时候混合的科学团队也不一定能够产生创新。[18]已有研究表明,虽然多样性可以催生创新,但为组织带来多样性的边缘人员和群体往往并不能从组织中收获其应有的成功,这通常是受到了社会中一些传统的、结构性的限制,例如性别和种族等等。[19]因此,存在一个多样性的悖论(diversity paradox),尽管多样性可以给组织带来的许多正向的影响,但对个体而言,其所能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被大打折扣,这反过来可能会影响组织的整体绩效。因此,本文认为组织混合程度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工作队对于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影响也可能是非线性的。

(二)乡村振兴效果的测量

工作队是国家根据我国发展现状而设立的特殊混合组织,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改造[20],因而在衡量工作队的混合组织效应时,应被理解为是否完成了国家意志所设立的目标。当下正值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在此

期间全面乡村振兴的目标既需要巩固好脱贫攻坚以来的反贫困成果，又需要依托地区条件实现乡村的综合发展。因此，乡村振兴的效果测量应被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地区反贫困效果，目前学界主流应用的方法是由 Sen 提出的以能力方法定义贫困的多维贫困理论演变而来，称为多维贫困测量法。多维贫困测量法的核心观点是，人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贫困，也包括饮用水、道路、卫生设施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21]目前学界应用较多的维度包括了教育、医疗、卫生、人居环境、生产生活条件等。基于多维贫困测量法的理念，2011 年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规定了我国贫困测量的标准：“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因此，我国在脱贫攻坚期间使用的“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可以视为地区反贫困效果的测量标准。

另一方面是地区发展成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发展，其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长效提升村民收入增长则成为了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中央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农村生活设施便利化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22]虽然，目前学界对于乡村振兴效果的研究多以案例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为主，因此缺乏统一的乡村振兴测度标准。但是，在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牛鼻子”，为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奠定经济基础，[23]成为了大部分学者的共识。而产业振兴的基础，则需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步伐。[24]因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现代化生活环境、集体经济水平等要素进入了乡村振兴的视野范围。因此，本文基于乡村振兴中核心命题——农村现代化与缩小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出发，使用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地区发展能力对乡村振兴中的发展成效进行测量：

基于工作队的混合组织效应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的争议，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a: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对地区“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有负向效果。

研究假设 1b: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对地区收入增长率有负向效果。

研究假设 1c: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对地区发展能力有负向效果。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为连续变量，且基本满足正态分布，因此使用 OLS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于面板数据来说，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存在可能导致简单的 OLS 模型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偏误，因此需要设定个体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对无法观测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控制。[25]本文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选取时间、个体双固定模型进行回归。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驻村工作的混合组织效应能否取得相应反贫困效果，本文假定工作队的混合组织效应会影响地区乡村振兴效果，混合效应指数的大小会影响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大小。模型设定如下：

$$Y_{ct} = \beta_0 + \beta_1 rate_{ct} + \sum \beta X + \lambda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ct} \quad (1)$$

其中，Y 代表被解释变量，包括“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地区发展能力；控制变量 X 包括地区贫

困人口规模、地区政策支持力度、地区 t-1 时期人均收入。解释变量 rate 代表了工作队的混合效应指数。c 是地区下标，t 是时间下标， λ 表示固定效应变量(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ε 表示残差项。变量涵盖 2014—2021 年贵州省包含原建档立卡户的所有行政村。

(二) 数据来源与数据清洗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现乡村振兴局)与深圳大学共建的深圳大学-贵州省扶贫办精准扶贫与发展传播研究中心的贵州省扶贫大数据，包括以贵州省扶贫云为基础与其他相关部门横向连接的个体数据，并且数据转接时贵州省扶贫办已经对数据进行了脱敏处理^②以保障所有涉及的个体信息不被泄露^③。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贵州省所有的曾有建档立卡户的行政村，把这一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1) 贵州省是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建档立卡户最多的省份，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其体量本身就具备了重要代表性。并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划定了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贵州一省便涉及了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三个特困地区，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提升了样本的多样性，有效地代表了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状况；(2) 贵州省大数据基础完备，大数据建设工作开展较早，易于寻找长时间且连续时间段的数据资源。且贵州省扶贫云数据贮备丰富、数据颗粒度高，具备了同一群体横向交叉数据的基础，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本研究使用了贵州省扶贫云(包括其他相关部门横向连接，以下简称扶贫云数据)数据库内 2014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由于数据处理时，该数据只记录了 2022 上半年，因此把 2022 年并入 2021 年进行统计)近 9 年的在线文档数据，包括了贫困人口特征数据、贫困村与非贫困村面板数据以及工作队队员的个体特征数据^④。本研究对 2014—2021 的扶贫云数据利用 Python 进行了预处理，目的是为了把海量的异质性数据整合到同一计算维度上。在此基础上，以各村村编号为唯一识别码进行年份去重，横向匹配到工作队干部的系统编号数据，进行合并处理，最后共计获得 62045 个有效样本，样本涵盖了贵州省所有的曾有建档立卡户的行政村，上述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1。

表 1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收入增长率	62045	0.2570226	1.980507	-1	14.672477
地区发展能力	62008	12.58655	5.509193	1	33

²①其中某一个体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体特征信息均由一个无序且唯一的字符串替代，行政区划、地理位置等公共信息均由一个基于行政区划代码转换的无序且唯一的字符串替代，性别、民族、职级、工作单位等中文信息均由系统生成的字符串代替，其中性别、民族等定类数据为唯一字符串，职级、工作单位等定序数据为可重复字符串。

³②2014 年，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在全国率先探索建成扶贫开发专项系统——贵州精准扶贫信息平台即贵州省扶贫云前身，建立了全省 623 万贫困群众的数字档案。当前的贵州扶贫云系统，拥有 PC 端和 app 端 2 个载体，囊括 9 个州市 1 个新区、85 个扶贫任务县的 86 张数据表、1636 个数据项、2.1 亿条扶贫数据。

⁴③其中贫困人口特征数据包含了文化程度、在校生活状况、健康状况等数据。贫困村与非贫困村面板数据包含了行政村卫生室个数、行政村公共卫生厕所个数、行政村执业(助理)医师人数等。

“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	62045	4.195901	0.5996678	2.370455	5
组织混合程度	55984	0.3741897	0.2593636	0	0.9438775
地区经济水平	53481	-1.007077	1.191171	-8.193035	0.6931472
地区贫困人口总量	62045	6.106951	0.7713211	0.6931472	9.808132
地区政策支持力度	62010	3.116933	3.547674	0	15.62961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地区乡村振兴效果，本文设置了“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地区发展能力等三个被解释变量用以反映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强弱。其中，“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源自于(当地)现行政策标准;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源自收入支出法对于贫困的测量;地区发展能力，源自于文献部分提到的乡村振兴效果的相关讨论。

(1) “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两不愁三保障”是我国现行政策脱贫标准的简称，其具体施行标准会根据各省实际情况微调，根据贵州省过去脱贫政策下的脱贫标准，本研究制定了“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以测量当前政策要求下的地区反贫困能力。具体计算方法如表 2:

表 2 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政策标准^⑤

指标	标准	赋 值
----	----	-----

⁵ ①2020 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不再更新，因此 2021 年沿用的是 2020 年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

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	贫困人口： 2015 年人均收入>2968 元 2016 年人均收入>3146 元 2017 年人均收入>3335 元 2018 年人均收入>3535 元 2019 年人均收入>3747 元 2020 年人均收入>3972 元	1: 年人均收入>该年标准，0: 年人均收入≤该年标准
	贫困户：是否解决安全饮用水	1: 是，0: 否
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贫困人口：在校生状况、教育厅教育资助	1: 在校生不为零且同年有资助，0: 其他
	贫困人口：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否参加大病保险、是否参加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1: 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否参加大病保险、是否参加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均为是，0: 其他
	贫困户：是否危房户	0: 是，1: 否

通过这一赋值可以为每一年每一位贫困个体计算得到一个具体数值，把这些数值加总到村以后除以村总贫困人口数，得到村“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通过对于政策层面的反贫困效果的测量，可以获取村级贫困群体在当前政策标准下反贫困效果的变化。

(2) 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本研究中将数据中村人均纯收入(观察值)提取出来，然后计算当年观察值与前年观察值差值除以上前年观察值，得到观察值增长率，即村贫困群体人均收入增长率。通过对于贫困群体直接地收入增长率的测量，可以直接得出该地区贫困群体收入增长的真实情况。

(3) 地区发展能力，指的是地区资源禀赋的综合指标。经济学中，按出口产品收入对地区经济活动进行描述测量的一个常见指标是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本文引入这一思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相关要素构造地区发展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而反映地区发展能力，计算方法如下：

对地区的资源禀赋进行梳理，包括行政村卫生室个数、行政村公共卫生厕所个数、行政村执业(助理)医师人数等村级资源禀赋要素指标(详见表 3)，并对每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地区每项资源禀赋的显性比较优势进行计算：

$$REA_{cjt} = \frac{k_{cjt} / \sum_j k_{cjt}}{\sum_c k_{cjt} / \sum_{c,j} k_{cjt}}; x_{cjt} = \begin{cases} 0, & REA_{cjt} > 1 \\ 1, & REA_{cjt} \leq 1 \end{cases} \quad (2)$$

其中，k 代表标准化后的资源禀赋数值，c 代表地区，j 代表资源禀赋类型，t 代表年份。显性优势指数的核心思想是将 c 地区 j 类型的份额与该类型全地区范围内的样本平均份额进行比较。一个地区在某项类型的份额大于全样本平均水平时，在该类型份额上，该地区具有显性优势。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具有优势的资源禀赋类型越多，则该地区的发展能力越强。[26]对每

$$diqutotal = \sum_j M_{cj}$$

年所有的

指标构建一个二维矩阵

$$diqutotal = \sum_j M_{cj}$$

，其中

$$diqutotal = \sum_j M_{cj}$$

表示 c 地区在 j 领域是否拥有显性优势。对矩阵

$$diqutotal = \sum_j M_{cj}$$

进行列加总，可以得到地区多样性(Diversity)，代表地区发展能

力：

$$Diversity = \sum_j M_{cj} \quad (3)$$

2. 解释变量。组织混合程度，本文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简称 HHI)来测量工作队的组织混合程度。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27]本研究借助 HHI 的思想，利用工作队的成员的单位等级来测量工作队内部的分散程度，从而构造出一个工作队的组织混合程度的解释变量，该变量主要反映了工作队内部的混合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rate_c = 1 - \sum_{z=1}^Z \left(\frac{x_{cz}}{X_c} \right)^2 \quad (4)$$

其中，下标 z 表示帮扶干部所属的不同单位， X_c 表示 c 地区帮扶干部总数， x_{cz} 表示 c 地区来源于 z 单位的帮扶干部数量，减号以后的部分即常见的 HHI 测算方法。 $rate$ 指数的值越大，说明帮扶干部的组织分散程度越高，也就是混合程度越高。

表 3 地区发展能力的维度、指标描述

行政村公共卫生厕所个数	计数
行政村执业(助理)医师人数	计数
行政村生产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个数	计数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数	计数
开展乡村旅游的户数	计数
经营农家乐的户数	计数
经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户年均收入	计数
行政村文化(图书)室个数	计数
通宽带的村小学个数	计数
行政村信息员个数	是 1, 不是 0
到乡镇是否通硬化路	是 1, 不是 0
耕地面积	计数
有效灌溉面积	计数
林地面积	计数

退耕还林面积	计数
林果面积	计数
牧草地面积	计数
水面面积	计数
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	计数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计数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计数
中共党员人数	计数
大学生村官人数	计数
是否通客运班车	计数
已通电自然村个数	计数
通宽带户数	计数
能用手机上网的户数	计数
总户数	是 1, 不是 0
总人口数	是 1, 不是 0
劳动力人数	计数
农民人均纯收入	计数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万元)	计数
参加大病保险人数	计数

是否接入光纤宽带	是 1, 不是 0
经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户数	计数
乡村医生人数	计数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人数	计数
村小学个数	计数
通生产用电	是 1, 不是 0
通生活用电	是 1, 不是 0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各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其他一般性因素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添加了如下控制变量:地区经济水平,主要反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为滞后一期的人均收入对数形式;地区贫困人口总量,指标为地区建档立卡人口数;三是地区政策支持力度,指标为村扶贫项目所获总资金,依据项目持续时间按年度取均值,并按村合计。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表 4 汇报了基于(1)实证基准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从表 4 第 3 行可以看出,工作队的组织混合程度与人均收入增长率、地区发展能力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均在 1%的置信水平内显著相关。因此,在不控制模型的潜在内生性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表 4 的结果表明了工作队的混合组织特征有效地促进了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提升,混合程度越高的工作队显著提升了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实现,而且这种促进效果无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还是促进地区综合发展方面均有体现。因此,研究假设 1a、1b、1c 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 4 基准模型(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变量名	人均收入增长率	地区发展能力	“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
组织混合程度	0.0436**	0.6436**	0.0439***
	(4.4837)	(6.6653)	(7.7367)
Constant	0.1041**	8.9869**	3.9561***

	(10.5496)	(91.8569)	(686.8793)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55,984	55,947	55,984
R-squared	0.310	0.197	0.882
Number of code	16,219	16,204	16,219
r ² -a	0.0277	-0.130	0.834
F	2546	1395	4249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与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以下各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控制变量。

表 5 汇报了本文利用地区贫困人口总量、地区经济水平以及地区政策支持力度对实证结果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即使加入控制变量后, 表 5 的第 3 行结果表明在 1% 的置信水平内工作队的组织混合程度与人均收入增长率、地区发展能力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呈现显著相关, 这与表 4 汇报的结果一致, 表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得到了有效检验。

表 5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综合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变量名	人均收入增长率	地区发展能力	“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
组织混合程度	0.068 *	0.362	** 0.053***
	(6.55)	(3.64)	(8.82)
地区贫困人口总量	1.132**	2.172 ***	0.806***
	(18.08)	(3.64)	(22.14)
地区 t-1 时期人均收入	-0.329***	-0.044	0.043**
	(-72.92)	(-1.02)	(16.32)
地区政策支持力度	0.004**	0.098 ***	-0.001**
	(3.30)	(9.17)	(-2.10)
Constant	-6.593***	-1.413	-0.378*

个体固定	(-17.93)	(-0.40)	(-1.77)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51,076	51,039	51,076
R-squared	0.422	0.141	0.905
Number of code	16,218	16,203	16,218
r ² -a	0.152	-0.258	0.861
F	2822	637.7	37024

(三) 进一步讨论

虽然表 5 的结果证明了工作队的混合程度的提升可以促进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实现。但学界发现的，工作队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的在地化挑战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认为工作队的混合程度与地区乡村振兴效果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从而导致了过去学界对工作队这一混合组织的争议。基于上述考量，表 6 汇报了利用非线性模型下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对人均收入增长率、地区发展能力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的非线性关系检验。表 6 的实证结果表明，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对于地区发展能力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在 1%的置信区间上存在非线性关系，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地区发展效果方面存在一个先升后降的倒 U 型曲线，而样本区间内并未反映出工作队的混合组织程度对人均收入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

表 6 关于非线性效应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变量名	人均收入增长率	地区发展能力	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
组织混合程度(平方项)	-0.019	-1.213***	-0.066 ***
	(-0.48)	(-3.16)	(-2.81)
组织混合程度	0.081**	1.161***	0.097 ***
	(2.85)	(4.28)	(5.84)
地区贫困人口总量	1.133**	2.180**	0.807**
	(18.09)	(3.66)	(22.16)
地区 t-1 时期人均收入	-0.329*	-0.042	0.043***

	(-72.90)	(-0.98)	(16.36)
地区政策支持力度	0.004**	0.097***	-0.001*
	(3.29)	(9.11)	(-2.16)
Constant	-6.595**	-1.484	-0.381*
	(-17.93)	(-0.42)	(-1.78)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51,076	51,039	51,076
R-squared	0.422	0.142	0.905
Number of code	16,218	16,203	16,218
r ² -a	0.152	-0.258	0.861
F	2540	575.1	33329

因此,本文提出:随着工作队的混合组织程度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地区乡村振兴的效果,工作队独特的混合构建机制不仅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在促进地区人均收入增长和地区综合发展能力能方面提供了臂助。工作队带来的混合组织效应,在长时段内大规模的政策执行效果上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发现,从实际政策执行的效果出发,由工作队的混合组织程度促进的乡村振兴效果提升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大边际效用。因为,工作队在执行政策时确实会遇到复杂的在地化场景所带来的阻碍,混合程度过高的工作队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确会遇到前文献中所提及的种种乡土层面的困难。因而既需要建立成员来源更为多样化的工作队从而突破在地化的实际阻碍,同时也应注意保留一定的本地干部名额,从而帮助工作队更充分地实现其职能。本文在实证检验中发现的非线性关系正好解释了过去大多基于定性研究的经验证据对工作队的混合组织效应的争议,为揭示工作队促进乡村振兴机制提供了实证经验证据。

五、结论与讨论

工作队制度是我国长期以来倚靠的重要政策工具,工作队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过去部分文献对于工作队在实际工作中的政策效果产生了质疑,尤其是针对工作队独特的混合构建制度,大多研究都指出了工作队难以绕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在地化乡土环境的影响,从而限制工作队促进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实现。本文基于2014—2021的贵州省扶贫大数据,分析了工作队的混合程度对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地区发展能力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发现了工作队的混合程度与地区发展能力与“两不愁三保障”综合指标存在倒U型曲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上述发现,笔者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整个样本区间内,工作队混合程度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地区乡村振兴的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无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是促进地区综合发展,工作队的政策施行效果方面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佳区间,在工作队构建时需要考虑在本地干部的比例。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之所以把工作队构建成为一个混合组织,理论上对外工作队应该引入外部促发展资源实现乡

乡村振兴效果、对内与村支两委协作博弈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打通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公里”，保障了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的实证结果反映了工作队混合程度的提高显著地影响了地区乡村振兴效果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在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工作队应保持成员来源多样化的惯例，以便巩固地区脱贫攻坚成效、保障人均收入增长、促进地区综合发展提升。但是，从政策落实层面出发工作队混合组织效应存在一个理论上的边界，构建工作队时也需要注意本地干部与工作队在乡村振兴实践合作中的竞合博弈带来的负面效果，不能一味追求工作队干部来源的多样性。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在未来的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多样化地选派工作队成员仍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制度保障。并且，应注意到工作队不仅仅只是一个外部资源的注射器，在多样化工作队成员来源的同时需要兼顾在地化需求，使工作队的乡村振兴效果得以更好地发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3-07.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EB/OL]. [2022-06-05].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5/11/content_5605841.htm.
- [3] 钟海. 超常轨化运行:工作队的角色塑造与运作逻辑——基于陕南L村的田野调查[J]. 求实, 2020(3):95-108+112.
- [4] 刘建生,涂琦瑶,等.“双轨双层”治理: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基层贫困治理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1):138-144.
- [5] 江国华,项坤. 从人治到法治——乡村治理模式之变革[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5-9.
- [6] 王雨磊. 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J]. 社会学研究, 2016(6):119-142+244.
- [7] 孔令英,郑涛. 乡村治理视角下民族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于新疆南疆地区两个村庄的调查[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4):19-25.
- [8] 葛笑如,刘祖云. 工作队驻村帮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及再结构化研究——以苏北G县为例[J]. 理论与改革, 2018(6):30-43.
- [9] 朱新武,谭枫,秦海波. 工作队如何嵌入基层治理?——基于“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案例的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20(3):84-101+195-196.
- [10] 李壮,李亚雄. 论精准扶贫中工作队的双重联结与双轨治理——鄂西L镇的个案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2):90-97.
- [11] 袁立超,王三秀. 非科层化运作:“干部驻村”制度的实践逻辑——基于闽东南C村的案例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131-137.
- [12] 金慧,余启军. 精准扶贫背景下工作队的文化扶贫作用与机制构建——以湖北通城县H村Z大学工作队为例[J]. 湖北社会科学, 2019(8):52-59.
- [13] 邓燕华,王颖异,刘伟. 扶贫新机制: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组织、运作与功能[J]. 社会学研究, 2020(6):44-66+242-243.

-
- [14] Masten S E.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challenges,progress,directions[M]. Springer,Dordrecht,1996. 43-64.
- [15] 胡锴. 制度理论中的混合组织:一个案例研究框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37-47.
- [16] 汪三贵, 胡骏. 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2):4-14.
- [17] Uzzi B,Mukherjee S,Stringer M,et al. Atypical combinations and scientific impact[J]. Science,2013(342):468-472.
- [18] Edmondson A C,Harvey J F. Cross-boundary teaming for innovation:Integrating research on teams and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2018(4):347-360.
- [19] Hofstra B,Kulkarni V V,Munoz-Najar Galvez S,et al.The diversity - innovation paradox in scienc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20(17):9284-9291.
- [20] 冯仕政.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J]. 开放时代, 2011(1):73-97.
- [21] Sen A. Poverty: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J]. 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76(2):219-231.
- [22]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1-02-22.
- [23] 叶兴庆.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 改革, 2018(1):65-73.
- [24] 曹立,王声啸.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42-48.
- [25] Hausman J A,Taylor W E. Panel data and unobservable individual effects[J]. 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81(6):1377-1398.
- [26] 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12):1-25.
- [27] 孔东民, 刘莎莎, 王亚男. 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J]. 经济研究, 2013(2):55-67.

注释

4(1)2020 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不再更新,因此 2021 年沿用的是 2020 年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